

上海 革命文化 大事记

1919—193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合编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合编

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

1919-1937

SHANGHAI GEMING
WENHUA DASHIJI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国华 彭卫国

封面设计：范一辛

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

(1919·5—1937·7)

*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扬中市印刷厂排印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8.125 字数 726,000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

ISBN 7-80569-958-5/K·196

定价：30.00元

沪新登字 119号

概 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对传统的封建文化也未触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一步壮大起来，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先进分子目睹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充满着忧虑。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进一步向西方寻求真理。他们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掀起了一场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当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在探索出路的时候，俄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这一学说，并以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1919年5月发生于北京并迅速蔓延全国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崭新的革命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热心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同实际结合，同工人运动结

合,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是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中国革命文化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本书记叙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前半部分,即1919年5月至1937年7月这18年间上海文化战线上发生的大事。

一、“五四”时期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1919年5月,五四运动主将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纷纷出现在许多大城市,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等。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开展较早的一个城市。1919年初,《时事新报·学灯》进行革新。同年6月,《民国日报·觉悟》创刊。同月,《星期评论》创刊。它们都注重研究、介绍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大量文章。1921年初,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后,大加改革,使之成为一个大型新文学刊物,也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获释后离京返沪,《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陈独秀即以新青年社为中心,聚集了李汉俊、陈望道、李达、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等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一个热心研究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他们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把它当作一门学说进行探讨，而是作为观察事物和自己行动的指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结合实际，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参加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学校，向工人宣传，同时向工人学习，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被北洋军阀政府视同“洪水猛兽”，迭遭暴力摧残，而且还受到来自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反对和阻挠。“五四”以前早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一批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在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内部就开始分化。一向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社会问题是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这场争论后来因《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封而未能继续下去，但对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上海又发生了一场持续一年多时间的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1920年11月，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所以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开发实业，增加富力。梁启超也在《改造》上发表文章，附和张东荪的观点。陈独秀、李达、陈

望道、邵力子等纷纷在《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在反对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同时，还批判一种有较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即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很早就传来中国。它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约束和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等，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它在反对封建军阀反动政权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它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念。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较系统地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并重申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和建立一个具有统一意志和严格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通过这场论争，教育了许多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使他们认清无政府主义决不是他们的理想王国。有不少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论争中，显示出自己的革命性、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一步一步地在中国大地上扩大自己的阵地；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论争中受到锻炼。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个小组除进行一些组织工作外，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并建立新青年

社作为出版机构。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旗帜鲜明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载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批判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以及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宣传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探讨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酝酿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准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创办了《劳动界》，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基本道理，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小组成员还深入工人群众，开办工人夜校，加速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期间，还出版了不少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宣传出版工作的重要性，使党的宣传工作得以更积极的开展。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开始系统地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和其他新文化理论书籍。次年9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创刊；1923年7月，又出版《前锋》。这些刊物从不同的角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策略。党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不但在数量上比“五四”时期有了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提高。

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对文学革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进步作家开始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组成社团，有组织地开展活动，把中国的文学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了40多个文艺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王统照、耿济之等。他们主张文学应该“为人生”，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成，前期创

造社成员的文学主张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观虽不尽相同，但在繁荣新文学，培养文学新人，推动新文学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各方面都很有成就。在新诗方面如郭沫若的《女神》，它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成功地运用新诗的主要形式自由体，歌唱了中国人民的希望、理想、愤怒和反抗。瞿秋白的《赤潮曲》，则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整个旧世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显示出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蒋光慈的《新梦》，倾诉了对“红色的俄罗斯”的深情赞扬，号召中国人民“推翻贪暴凶残的军阀，解放劳苦同胞的锁扣”。在散文方面，如朱自清的《踪迹》、《背影》，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等也都有较高的成就。瞿秋白在旅俄期间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生动地记录了作者由一个追求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路历程，以其清新隽永的风格特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散文佳作。小说方面有郁达夫的《沉沦》、叶绍钧的《隔膜》、许地山的《命命鸟》等，大多是短篇，都反映了对时代和社会的关切，富有现实主义倾向。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绩不太显著的现代戏剧运动，此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21年3月，郑振铎、沈雁冰、欧阳予倩、汪仲贤等发起成立民众戏剧社，并创办《戏剧》月刊。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较早的一本戏剧刊物，创刊号刊有民众戏剧社的《宣言》，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剧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它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宣言》还阐明了该社重视戏剧的社会作用，倡导建立民众戏剧院，提倡组织“爱美”剧团（即非职业的剧团）等戏剧主张。在这些主张的影响下，上海剧坛陆续出现应云卫、谷剑尘、洪深等组织的戏剧协社，朱穰丞、马彦祥、袁牧之等组织的辛酉剧社，

和田汉创办的南国社。他们的戏剧创作题材涉及妇女解放、家庭伦理、婚姻纠葛、军阀混战等方面，带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如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等。这些剧社坚持排练制度，实行专职导演，采用立体布景、道具和舞台监督，并冲破传统的世俗偏见，实行男女同台演出。他们陆续上演了洪深的《赵阎王》、欧阳予倩的《泼妇》、谷剑尘的《孤军》、汪仲贤的《好儿子》等；特别是洪深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这使中国的话剧开始走上现代戏剧的正规道路，为30年代的左翼戏剧运动打下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惊恐，查禁进步书刊，逮捕编辑及主要撰稿人的事时有发生。一批封建买办文人也趁机向进步文化力量进行反扑。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出版，连续发表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等文章，主张白话不能代替文言，言文不应合一，反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社会改革，指责马克思主义，认为新文化运动“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与南方的学衡派相呼应，胡适在北京也打出了“整理国故”的旗帜，于1922年、1923年，分别创办《读书杂志》、《国学季刊》，鼓吹“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企图把青年从革命的潮流中引开，去啃故纸堆。对南北这两股封建复古的反动逆流，瞿秋白、肖楚女、邓中夏、沈雁冰、沈泽民、郑振铎、郭沫若、成仿吾等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批驳，保卫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成果。然而，只要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还保持一定的势力，依附于它们的文人仍然会兴风作浪。所以在学衡派和整理国故运动败下阵来后不久，1925年又出现了甲寅派。他们以《甲寅周报》为阵地，竭力提倡古文，反对白话文，宣扬封建复古思想，攻击新文学运动，再次掀起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这股逆流，同样也遭到鲁迅、蒋光慈、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严正批

判。在反复的较量中，封建复古逆流遭到沉重的打击，许多新文学工作者也在斗争中经受考验，不断地推进着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为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3年11月，党在上海创建上海书店，作为党的总发行机关。上海书店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将党的所有对外宣传的书刊以最低廉的价格贡献于读者。随着业务的增长，上海书店还在沪东、沪西等处设立分销处，并以上海为中心，在武汉、长沙、广州、南昌、宁波以至香港、巴黎等城市建立了发行网络，使党的出版物能迅速地传至四面八方。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东南师专的学生，把该校改组成上海大学，校长是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日常的行政和教务工作由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负责主持。经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李汉俊、沈雁冰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上海大学不但在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马列主义，培养党的干部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成为“五卅”反帝斗争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

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发展。1925年5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上海租界各报慑于租界当局的压力，不敢报道事实真相。为了冲破帝国主义的新闻封锁，推动伟大的反帝斗争，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热血日报》以发扬“民气”、“作被压迫民众的喉舌”为自己的天职，大量报道了上海和各省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进展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深受人民欢迎。上海的许多进步团体也纷纷出版宣传五卅运动的报刊，如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公理日报》、上海

总工会的《上海总工会日报》、上海学联的《血潮日刊》、上海工商界的《爱国日报》等等。通过这些报刊的努力，上海人民反帝爱国的呼声终于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传遍全国各地。

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使混迹于国民党内的地主、买办、军阀、政客日益惊慌不安；孙中山的逝世，更加速了国民党内部新的分化。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在上海先后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在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口号下，曲解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共合作，声称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这就是戴季陶主义。对国民党右派掀起的这股反共思潮，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所谓“纯正三民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不能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戴季陶排斥共产党人，妄图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势必失掉工农群众，因而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走向胜利。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也加深了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还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1924年10月，曾琦、李璜、左舜生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超阶级国家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著文予以批判，指明国家主义者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却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专门反苏反共，反对被压迫工农的解放，这就说明国家主义派实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工具，是一个反革命派。1925年11月，中共中央还发出《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的通告，揭露了它的“卖国家，欺民众”的真面目。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文学领域有革命文学的酝酿与提

出。从1923年到1926年，瞿秋白、恽代英、蒋光慈、邓中夏、萧楚女、沈泽民、沈雁冰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为了完成文学革命必须有革命文学的主张。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现象，着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阐述文学与生活、文学与革命、文学创作与作家世界观的关系等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既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革与时代精神，同时也要积极能动地促进社会生活的变革，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服务。他们强调作家要有革命的思想感情，积极投身于变革现实的斗争实践，然后才能创作出革命的文学。经过“五四”、“二七”、“五卅”的政治风暴洗礼而日渐成熟的进步文化人士，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围绕革命文学及其内容、形式等进行了广泛的论争。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明确提出在阶级社会中，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都具有阶级性，阐述了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背景、条件，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发表了许多文章，尽管他们对革命文学的论述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尚有某些偏颇，但这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探讨，为下一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以自己的实践，创作出一些直接反映工农革命群众的作品，如蒋光慈的小说《疯儿》和诗集《哀中国》以及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小说《短裤党》等。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活跃于上海文化战线上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知识分子，有的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的深入工厂、农村，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留在上海的也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进行职工运动，开展政治罢工，直至组织武装起义。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汪精卫也在武汉搞了“七一五”分共阴谋，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

烈的大革命失败，苦难的中国又陷入了黑暗之中。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单独领导群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从血腥的现实中认清了敌人，提高了自己，更坚定地投入新的斗争，开展左翼文化运动。

上海以其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地位以及华洋杂处的独特环境，成为许多进步文化战士的新的聚集地。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与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四一二”后，他目睹广州4月15日的大逮捕大屠杀，在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927年12月，《语丝》月刊迁上海出版，鲁迅担任主编。鲁迅在主编《语丝》期间，不屈不挠地同黑暗作殊死斗争，使《语丝》成为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阵地之一。1928年6月，鲁迅又与郁达夫合作，创办《奔流》月刊，译载了他翻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同年11月，鲁迅又和柔石等组织朝花社，出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介绍北欧、东欧的文学和版画，对推动我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大批原先投身于实际斗争的文化人，如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冯雪峰、周扬、钱杏邨、蒋光慈、李一氓、阳翰笙、郑伯奇等，也纷纷从广东、湖南、湖北等地转来上海，继续开展以文化为武器的革命活动。相继抵达上海的还有留学日本的青年作家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王学文等，以及柔石、胡也频、丁玲、叶紫等向往革命的文学青年。这样，上海的革命文化

力量有了较大的增强。

从1928年开始，共产党和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上海建立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昆仑书店，专事马列主义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重译、再版或新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资本论》的一部分等经典著作。据统计，这一时期新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近40种，形成了马列主义传播的又一高潮。

当时，上海的进步文化力量，基本上都汇集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内。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分别建立党的小组，按所在区域编入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由潘汉年任支部书记。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共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由潘汉年任书记，归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年冬，改归中央宣传部领导。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后，1929年10月，扩大成立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仍由潘汉年任书记，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

随着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及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青年作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以《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等刊物为阵地，发表文章，阐述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并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创作。他们认为“新兴的革命文学”，“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写实主义”。这是1923—1926年间倡导的革命文学的发展。在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能够把文学活动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显得十分可贵。但由于受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

论缺乏深刻全面的理解，将革命文学仅仅局限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们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把鲁迅等一批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并错误地加以批评和攻击，从而引起了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对此，鲁迅进行了必要的反批评，指出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目前革命者的任务主要是反对官僚，反对军阀。他批评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青年革命作家“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

论争后期，冯雪峰于1928年9月25日在《无轨列车》上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批评了创造社的小团体主义，并对鲁迅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缓解了这场论争。1929年下半年，这场论争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在经过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后，中央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都是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并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等人的批评，结束论争，争取把所有进步文艺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1929年10月15日，文委书记潘汉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发表《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就太阳社、创造社的教条主义倾向作了自我批评，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结束这场论争的观点。同时，分别与鲁迅和太阳社、创造社主要成员商谈停止论争，建立左翼文化联合组织的事宜。历时年余的这场论争终于平息。

革命文学论争使广大进步作家进一步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必要性，同时也推动了进步文化界的初步联合和统一，为中国左翼文化组织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举行，选举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大会通过的行动总纲领明确宣告“我们文学运动的

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确定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训练新作家，提拔工农作家”。鲁迅在会上讲话，以他丰富的革命实践的经验，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针对当时左翼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指明了革命文学运动发展的方向。

左联成立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其他领域也陆续建立了各自的统一组织，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和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为了协调和统一领导这些左翼文化团体，1930年10月，文委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之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记联）、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以及电影小组、音乐小组、苏联之友社等，并先后加入文总，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革命文化队伍，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随后，一大批进步刊物出现了。几乎每一个左翼社团都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左联就出版了《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学导报》、《文学月报》、《巴尔底山》、《十字街头》等10余种，左联与社联联合出版了《文化斗争》。社联出版了《新思潮》、《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现象》、《社会科学讲座》等。剧联有《艺术新闻》、《戏剧新闻》等。此外，还有《南国月刊》、《艺术月刊》等等。在充满白色恐怖的海，革命文坛呈现一片不屈生机。

他们利用各自开辟的阵地，全面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设。革命文学论争中提出的接近工农、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观点，已进一步发展为文艺大众化，并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口号。为此，左联专门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通过《大众文艺》月刊多次组织专题讨论，鲁迅、郭沫若、夏衍、潘汉年、冯乃超、郁达夫、钱杏邨、冯雪峰等都发表见解。他们根据列宁关于艺术是属于民众的，艺术应该生长在民众里的观